

“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与审美流变

——基于《林海雪原》两版电视剧的文本分析

董卉川 赵箫唯

“红色经典”这一概念在学界通常指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出版于1957年,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文本之一,讲述了东北民主联军剿匪小分队在茫茫林海雪原中与土匪武装斗智斗勇的故事。小说兼具革命历史叙事与民间英雄传奇的双重基因,为后来的影视改编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2003年,李文岐导演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以下简称“2003版”)在央视播出,成为“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浪潮中的代表性作品。14年后,金姝慧、刘礴联合执导的新版《林海雪原》(以下简称“2017版”)登陆卫视与网络平台,以更大的制作规模和更鲜明的商业美学引发关注。两部电视剧改编自同一部小说,相隔不过10余年,却在叙事策略、视听语言与情感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中国电视剧生产机制、受众审美心理与主流话语在21世纪初期的深刻变迁。本文无意对“红色经典”作宏观全景式的梳理,而是聚焦上述两部电视剧文本,通过细读与比较,考察《林海雪原》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重新讲述的方式,进而揭示影视改编在红色精神内核与市场逻辑、受众期待之间的调适逻辑。

一、叙事策略的转型:从群像革命叙事到孤胆英雄传奇

如果说“讲什么故事”决定了改编文本的底色,那么“怎样讲故事”则直接塑造了观众与历史相遇的方式。在《林海雪原》的两版电视剧改编中,叙事策略的转型成为审美流变最为显豁的表征。叙事策略是改编实践中最直观也最具统摄性的维度。它决定了故事的讲述方式、人物的位置及意义的生成机制。

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内含革命史与传奇性两种叙事传统的交汇。它既以东北剿匪斗争为历史背景,塑造了一支由少剑波、杨子荣、栾超超、刘勋谷等战士组成的英雄群像,又深受古典英雄传奇与民间评书的崇高感;又深受古典英雄传奇与民间评书的影响,尤其是杨子荣孤身入匪巢、智斗座山雕的情节,本身便具备强烈的传奇色彩和类型化潜能。这种双重基因决定了其影视改编天然存在两种取向——群像式的革命叙事与个人式的英雄传奇,而2003版与2017版恰好分别偏向两端,构成了一条可供分析的审美流变轨迹。2003版《林海雪原》在改

编策略上相对审慎,剧集以剿匪小分队的集体行动为主线,虽突出了杨子荣的戏份,但少剑波的主导、白茹的情感、栾超超等战士的牺牲均得到相对均衡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2003版播出后,“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年前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监管关注,而该剧恰好处于这一舆论风潮的前夜,其稳妥的改编策略——尊重原著基本框架、避免对英雄形象过度人性化处理、保持集体主义底色——已体现出审慎姿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2017版《林海雪原》的叙事重心则发生了显著位移。剧集以杨子荣深入威虎山为主线,大幅增加了其前史叙述,将符号化的革命英雄转化为有过去、有牵挂、有内心矛盾的“人物”,同时对其他成员的刻画明显压缩,叙事节奏加快,悬念设置向商业类型片靠拢。这一演变的背后,是对人物情节张力和叙事观赏性的更高要求,同时也得益于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得市场逻辑与观众审美获得了更大话语权——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叙事,比群像式的革命叙事更能满足10年代观众对快感体验与情感卷入的期待。

二、视听语言的美学转向:从纪实风格到类型化奇观

如果说叙事策略决定了“讲什么故事”,那么视听语言则决定了“如何讲故事”。在《林海雪原》的两版电视剧改编中,视听语言的美学转向同样显著,折射出中国电视剧制作观念与技术手段在十余年间发生的深刻变化。

2003版《林海雪原》的视听语言带有早期“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典型特征:实景拍摄为主,色调偏冷但饱和度较低,镜头规整,战斗场面以中近景呈现,动作设计写实,较少追求视觉奇观。这种相对朴素的风格既有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一种策略性的自我约束——21世纪初的国产电视剧尚未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美学意识,而“红色经典”改编在当时被视为需要审慎对待的文化实践,过度的视觉炫技可能被解读为对革命叙事的戏说或消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2017版剧作更为丰富的复调情感结构。该剧在雪景实拍的基础上,大量运用航拍、高速摄影、CG特效等现代技术手段,以冷峻的青蓝色调营造出强烈的类型片氛围。更为关键的是,2017版主动借鉴了武侠片、警匪片、西部片的视听语法:杨子荣的“卧底”行动被赋予类似《无间道》的悬念张力,剿匪小分队与土匪的对抗呈现出正邪对决的二元对立美学,打斗场

面融入了武术设计元素。这种“红色+类型”的融合策略,反映了1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改编的商业化转向——在保留革命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类型化的视听语言重新激活文本的观赏性。值得注意的是,2017版的视觉升级并非单纯的炫技:航拍镜头下的林海雪原既提供了壮观的视觉体验,也强化了剿匪斗争的艰苦环境与英雄的孤独感;高速摄影下的战斗场面在制造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将牺牲与死亡的瞬间赋予了悲壮的美学意味。换言之,2017版的视听语言并非外在于革命叙事,而是深度参与了情感结构的建构。

三、情感结构的演变:从革命英雄主义到复调情感结构

叙事策略的转型与视听语言的升级,最终汇聚于情感结构的层面。所谓情感结构,指的是文本所营造的、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召唤去体验的核心情感模式——观众被期待以何种方式与剧中人物建立情感连接,又在何种情感基调中完成对故事的接受与认同。在2003版与2017版《林海雪原》之间,情感结构的演变构成了审美流变最深层也最具有文化症候意义的维度。

2003版《林海雪原》在情感结构上延续了原著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杨子荣的智勇双全、少剑波的沉着指挥、小分队战士的团结与牺牲构成了剧集的核心情感体验。剧中虽出现了少剑波与白茹之间的情感线索,但处理得极为克制,两人的互动多以含蓄的眼神、简短的对话、偶尔的并肩作战来呈现,从不发展为独立的爱情叙事线索,更像是革命叙事的“点缀”或“调味”。这种情感处理方式与21世纪初“红色经典”改编的整体取向一致:在政策规范的约束下,观众倾向于保持英雄形象的“纯粹性”,观众被邀请进入的情感世界,是一个以集体主义、革命纪律、英雄牺牲为核心价值的伦理空间,个人化的情感体验始终被置于革命叙事的从属位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2017版在情感结构上达到了更为丰富的复调性。该剧在保留革命英雄主义基调的同时,系统地引入了多条情感线索——杨子荣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少剑波与白茹之间含蓄的爱情、战友之间的兄弟情谊,甚至对反派角色的有限心理刻画,这些线索与剿匪主线有机交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17版对杨子荣“卧底”身份的心理挖掘:他在威虎山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生死,孤独与压力被赋予充分的叙事呈现,使他不再是一个“高大全”式的符号化英雄,而是一个有恐惧、有牵挂、有内心挣扎的普通人。这种情感结构的调整,可以被理解为从“崇高

美学”向“共情美学”的转型——2003版试图通过英雄的“非凡”激发敬仰,2017版则试图通过英雄的“人性”建立认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红色经典”与当代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

四、流变的内在逻辑:政策、市场与受众的三重合力

综观2003版与2017版《林海雪原》的审美流变,可以归纳出推动这一流变的三重结构性力量。其一是政策环境的演变:2004年前后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出台规范要求忠于原著,影响了2003版的审慎策略;而2017年政策话语转向“讲好中国故事”,鼓励用更具感染力的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观,为2017版的类型化创新提供了空间。其二是市场逻辑的渗透:2003版播出时央视承担较重宣教功能,市场尚未完全商业化;而2017版播出时网络平台已成为重要渠道,算法推荐、年轻受众偏好与会员制下的“爽感”需求共同推动改编向类型化、奇观化、情感化调适,60余集体量本身也是追求商业回报的市场决策。其三是受众审美的变迁:14年间好莱坞大片、美剧、韩剧、网络文学培养了一代观众对快节奏、强情节、人物深度和视觉奇观的期待,纯粹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逐渐失去感召力,观众更渴望看到有血有肉、会害怕会犹豫的英雄。三重合力并非平行运作,而是在改编实践中相互博弈妥协——2003版是在政策约束下对市场与受众的有限回应,2017版则是在政策放宽后对市场与受众的全面拥抱,理解这一博弈结构有助于从文化生产整体视野把握“红色经典”改编的历史逻辑。

从2003版到2017版,《林海雪原》的两次电视剧改编呈现出从群像革命叙事到孤胆英雄传奇、从纪实风格到类型化奇观、从革命英雄主义到复调情感结构的审美转型。这一流变并非线性进化或简单的价值替代,而是在政策环境、市场逻辑与受众审美的三重张力中不断寻求新叙事均衡点的动态过程。值得追问的是,随着短视频、互动剧、AI生成内容等媒介技术的迭代,以及受众审美偏好的持续分化,《林海雪原》的未来改编将走向何方——是进一步滑向商业类型片从而稀释其红色精神内核,还是在类型化外壳下寻找到更具当代感的革命叙事语言? 这些问题已超出本文分析范围,但无疑值得持续关注。通过对两版《林海雪原》的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生产机制、受众审美心理与主流价值观念的深层互动,提供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案例。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高中政治项目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罗金红

项目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通过高中政治的具体框节内容展示项目式教学模式,以“导、学、议、展、思”的形式进行,依托本地的地方特色,让学生在了解家乡的特色,贴合高中政治立德树人的课标任务。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年修订》中提出:“课程的学习需要突出综合性、实践性、探究性与项目化实施。”整合高中政治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核心素养,在真实的情境下开展教育教学,将知识点贯穿其中,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在授课过程中采取项目式教学,采用“导、学、议、展、思”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落实课堂教学任务。

一、项目式教学模式概述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突出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方法。在当前互联网发达的情况下,学生的见识想法得到很大的拓展,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够激发学生的内驱力,项目式学习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本篇论文以“导、学、议、展、思”的项目式教学模式进行梳理。

“导”,通过视频、小故事、新闻、身边的真实情境、一个提问等形式开启本节课的内容,旨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将学生拉回政治科目的学习中。

“学”,呈现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及课程标准,给予学生特定的时间在课本上阅读原文,旨在让学生在明确本节课的重难点内容把握考点考向。

“议”,提供特定的情境素材,在上一个环节之后,让学生先有几分钟的阅读时间,各个小组之间进行讨论分析。

“展”,经过讨论之后,小组成员分工合作,记录、总结、勾画等动作后,将答案展示给大家。

“思”即测,来到本节课的收尾工作,给出对应的变式训练题,学生随堂测试,巩固知识点。

二、跨学科融合下高中政治项目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基于项目式学习模式,本论文采用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第三课“我国的经济发展”第一框,本框讲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等基础理论,侧重讲的是发展思想、发展理念。

(一)导

播放“景谷40周年县庆宣传视频”,结合本地方的特色,将本土文化与知识点链接,真正做到立德树人。视频中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谷县”)的人民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景谷县40年的风风雨雨,道路由原来的泥泞变为平坦的水泥路,各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凤山的菠萝、威远的咖啡……“40年风雨的景谷县是怎样从贫穷县变成富裕县的”以这句话为问题,引出今天的课程“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学

“学”这一环节旨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展示课程学习目标和课程标准,让学生把握和理解学习的重难点。“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一框的学习目标是:给予学生五分钟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学习过程中教师进行梳理指导,以期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指导。学习结束教师根据所获信息进行知识点梳理。

(三)议

“议”,以小组的形式根据特定的情境进行讨论。“景谷各乡镇都有自己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诚挚邀请大家来景谷投资兴业,假设你是与会的某乡镇特色产区老板,请为你的产区代言,共筑景谷的发展。”展示永平镇、凤山镇、碧安乡、威远镇、景谷县的素材,让学生以“五个新发展理念”的知识为产区代言。

(四)展

“展”这一环节旨在培养学生的总结概括能力,小组推选代表,上台展示小组的成果,各个乡镇的发展中都蕴含了哪些发展理念,具体在材料中是怎样呈现的。例如:永平镇为解决撒药耗费劳动力,动力不足的问题采用无人机撒药,运用创新的发展理念,解决了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创新是第一动力。

(五)思

“思”这一环节旨在让学生在巩固本节课的知识,本节课通过五个乡镇的产业,让学生掌握五个新发展理念的知识,并以此突出景谷县依托五大新发展理念进行乡镇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本框“贯彻新发展理念”两框内容,通过项目式学习,以特定的真实情境融入知识点,引导学生掌握答题技巧。教育是一场长期的规划任务,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更要让学生用理论的知识去指导实践,本框内容采用本地的特色情境,真正做到了立德树人。

【作者单位: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本文为普洱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跨学科融合理念的高中政治项目式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5Y144)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的三重维度

李嘉玲 陈肇敏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其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个性化教育支持、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传播创新、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传播创新。

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依赖学校课堂和主流媒体,这种内容传播存在明显的现实短板。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成为破解传播困境、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具有精准高效的信息获取、图谱构建能力,能够辅助生成契合时代发展的教育材料,通过场景化叙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凝练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视化、具象化的认知情景和当代大学生审美相契合的视听符号,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深度融合。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

捕捉用户画像,基于大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学习兴趣,推送适配的教育内容,并通过收集反馈数据持续优化、调整教育内容,有效改善了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水漫灌式的内容传播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从“经验主导”到“数据赋能”的升级,提升内容传播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内化与价值共鸣。

二、人机协同模式: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态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态是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和教育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价值教育的时空限制,构建出“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的立体化平台。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拓宽教学场域,创设沉浸式交互体验,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感知抽象理论的现实应用,有效推动受教育者实现从价值领会到行为转化的跨越,真正实现全过程育人。同时,人工智能催生出“教师—学生—智能系统”的教育教学新型共同体。

教师把控价值引领方向,借助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程序性工作,将精力投入特色课程开发等创造性工作中。基于大数据反馈的学生差异化水平细化教学策略,从而改变传统班班授课模式下“一刀切”的教学现状,提升教学管理的效能。学生则借助人工智能的个性化问答与丰富资源,完成从被动接受者到能动手学习的身份转变,主体性和主动性得到有效发挥。

三、动态学习分析: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评价机制创新

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动态学习分析,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评价机制向数据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在纵向贯通维度上,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实时捕捉课堂互动、学习时长、在线讨论发言频次、测试答题正确率等数据,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学习轨迹进行全程动态追踪。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为大学生绘制个性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习发展曲线,形成全过程、可追溯的动态评价,打破传统评价滞后性的局限,为其动态优化提供客观依

据。在横向协同维度上,依托人工智能搭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质量协同评估系统,拓展学生自评、同学互评、督导测评、家庭与社会辅评等多元主体协同评价,拓宽评价广度与深度。同时,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评价信息的高效收集与整合,打造可视化评价平台,形成多维协同、动态连贯的评价报告,让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评价可量化,提高后续教育活动改进的针对性。

人工智能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入了新动能,切实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方法上更新,体验上更好,成效上更实。新时代要坚持以教育数字化为抓手,让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度融合、同向发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新模式、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本文系2025年度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智慧思政:数智时代‘00后’大学生主流价值观认同现状与培育路径”(XJ2025216)阶段性成果】

党建引领科技人才培育与发展路径研究

孟芯如

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国有企业是科技创新主力军,肩负着突破关键技术以及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的重任。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政治引领、组织保障、资源整合和机制创新等举措将党建优势转化为人才培育和创新优势,为国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是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政治引领,筑牢科技人才报国根基

科技人才是国企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其价值导向直接决定企业发展方向,党建引领国企科技人才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强化政治引领,引导科技人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大局。国企党委要把政治建设贯穿人才培育全过程,通过理论武装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厚植科技人才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国企可以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平台常态化组织科技人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通过专题研讨、

专家宣讲、红色研学等形式筑牢思想根基。

二、组织保障,构建协同育人组织体系

科技人才培育离不开健全的组织体系支撑,国企创新“党建+人才”模式,打破部门壁垒,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业务部门协同、基层党支部落实的协同育人格局,为人才培育提供坚实组织保障。

深化“党建+产业链”“党建+科研平台”融合,在重点科研团队、重大项目组设立临时党支部,实现项目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建到哪里、人才培育覆盖到哪里。某省属国企在重大工程攻关项目中设立临时党支部,由党员技术骨干任支部书记,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培育青年科技人才,实现项目攻坚与人才培养双提升。同时,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党建共建,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通过联合成立党员创新工作室、共建实验室和定向培养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某能源国企与高校共建订单式培养机制,定制人才方案,累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200余人,10余名青年人才成长为科研骨干,破

解专业人才短缺难题。

三、资源整合,打造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

良好环境是引才、留才和用才的关键,国企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政策、资金、服务等资源,构建覆盖科技人才引进、培育、成长、发展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为人才安心科研解决后顾之忧。

国企党委牵头制定《科技人才培养规划》等政策,明确培养目标、引进标准与激励机制。设立科技创新、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加大对重大项目 and 青年人才的资金投入。同时优化服务流程,建立一对一服务专员制度,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精准服务,升级科研基础设施,搭建优质创新平台。某国企建成3个科技创新平台,实施青年科技人才安居工程,建设人才公寓200余套,有效解决青年人才住房难题,提升人才归属感,并吸引高端人才加盟。

四、创新机制,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关键在体制机制创新。国企以党建为引领,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破除思想观念和制度障碍,建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人才创新积极性。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效益、技术攻关成效纳入核心指标。健全多元化激励机制,推行项目分红、股权激励、绩效激励等方式,对关键技术突破、重大成果转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重奖。某制造国企对攻克核心技术的党员团队给予100万元现金奖励并授予“党员创新先锋团队”称号,有效激发创新热情。

党建铸魂强根基,人才赋能促发展,党建引领国企科技人才培育发展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日后,国企应持续深化党建与人才工作融合,优化培育环境,创新发展机制,打造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科技人才队伍,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国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核生态环境有限公司)